

马丽华走过西藏

纪实

灵魂像风

二〇〇七
修订版

马丽华

I267

马丽华走过西藏
纪实 灵魂像风

二〇〇七 修订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像风/马丽华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1

(马丽华走过西藏纪实)

ISBN 978-7-80057-855-7

I. 灵…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9998号

灵魂像风

马丽华 著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次 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640×965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0千 彩色插图 46幅
印数 5000册
书号 ISBN 978-7-80057-855-7/I·66
定价 25.00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zzcb.com.cn 电话: 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

李敬泽

1. 在《尼赫鲁自传》第六章——《结婚和喜马拉雅山中的探险》中，尼赫鲁写道：

克什米尔的高山和山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决定不久就回去游览。我定过许多计划，打算过许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就使我高兴的就是准备去游历西藏的名湖玛纳沙天池和附近积雪的凯拉斯山。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甚至克什米尔我尽管怀念也一直没有去旧地重游。我忙于政治和社会活动，走不开。我用坐牢代替爬山渡海以满足我的游历热。可是我仍然定计划，这是一种虽然在监狱中也没有人能禁止的快乐。而且除此之外，在监狱中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常常梦想有那么一天，我漫游喜马拉雅山，越过这大山去看望我所向往的山和湖。然而年龄不断增加，青年变成中年，中年以后的时代更坏。有时我想到也许我将要衰老得不能去看凯拉斯山和玛纳沙天

池了。这种旅行即使走不到目的地也是值得一试的。

这些高山出现在我的心头，

山虽然危险，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么美丽。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

又过了很多年，我在一个朋友的小说里读到了这段话，我从中感到了一种“中年”气味：到中年，我们终于知道某些事物远在我们自身的界限之外，比如凯拉斯山和玛纳沙天池。

凯拉斯山即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雪山，而玛纳沙天池是冈仁波齐附近的玛旁雍错圣湖。

2. 二〇〇三年春天，我一直在读马丽华的书：《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和《藏东红山脉》。

那时我在南京，在俯瞰玄武湖的饭店里，每天晚上看着一场战争渐渐降临在一个名叫伊拉克的地方，我断定电视机前所有的人和我一样，被琐碎、冗长、注定无意义的延宕拖得疲惫、厌烦。深夜关上电视时，一股邪恶的怒气猝然涌来：如果它要来，那就快点来吧。

然后，我读《灵魂像风》，我听到马丽华说：

假如我是神，我会使他们如愿以偿。

回到北京时，战争打响，大众传媒的盛大狂欢终于正式开始，亿万双眼睛注视着荧屏，注视着杀戮、背叛、怯懦、愚蠢、傲慢和欺骗，摩西十诫，几乎每一诫都被公然践踏，一切愚行和不义都被“观赏”，亿万双眼睛是多么热切又是多么冷漠，“战争”填充着我们卑微的日常生活，当它迅速结束时，我们意犹未尽。

当然，还有 SARS，还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怯懦、愚蠢、傲慢、欺骗和冷漠……

就这样，我读完了《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我穿越高山和草原、寺庙和村落，结识农夫、牧人、巫

师、僧侣和神祇……

3. 马丽华属于一个漫长的人物谱系,这位山东女子一九七六年二十三岁时进藏,直到二〇〇三年。她是行走者,是书写者,尽管她自己很可能不愿承认,她还是一个“发现者”。

“发现”,这个词辉煌而幽暗,其中包含着现代精神的某些根本疑难,“发现”是知识的增进,是理性和进步,是观察和讲述,但“发现”也是蛮横的权力—暴力。

对西藏的现代意义上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葡萄牙在印度的传教士安德拉德神父,他和马奎斯修士于一六二四年起程,开始西方对西藏的首次探险,他们抵达了阿里,一路艰苦卓绝。此后三个多世纪,西藏抵御着纷至沓来的“发现者”,“发现”的一方和“被发现”的一方同样顽强;在这种对抗中,造物主站在西藏一边:那里的自然条件构成了坚固的屏障。

西藏的“发现”史是整个中国的“发现”史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伴随着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规划,也伴随着以理性和科学对古老民族的灵魂世界和生活世界进行全面的“去魅”和“启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山河大地的地理学探测和描述。

一九〇七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冈仁波齐雪山和玛旁雍错圣湖,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世界观中,前者是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众水之源,是众神居所,而后者是永恒的、洗净一切罪孽的湖;然而,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那山和水被斯文·赫定还原为纯粹的自然地理现象,笼罩其上的神奇光环被驱散,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在一个以人为中心重新组织起来的世界里,它们等待着被认识、被征服、被利用。

——这就是“发现”的真义。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后,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发现者”。斯文·赫定一九二七年后的历次考察是在中国知识精英的支持和参与下进行的,其中包括胡适、刘半农这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发现”从一种必须防范和抵御的异己力量逐渐演化成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冲动,“发现者”由早期的外国教士、商人、外交官、军人和冒险家,转变为本土的知识分子以至民

众。

二〇〇〇年，我曾参加一次沿黄河行走考察，我的行囊中始终携带的一本书是《亚洲腹地旅行记》。在很多地方，我都在寻觅和印证斯文·赫定的足迹，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所做的不过是对斯文·赫定的拙劣模仿。而在《西行阿里》中，马丽华写道：

斯文·赫定的旅行和事业总是充满了艰辛危险。在那曲地区旅行时，我就关注他的行踪，也处处与他所记述的相印证。为此，我在赞颂自己善良、温和的同胞的同时，也不得不钦敬那些为了事业甘愿吃苦冒险的西方人。我所看到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队的专著《西藏地貌》等大书中，还多处沿用了斯文·赫定当年的测量数据。

是啊，我们得承认，我们是“发现者”谱系中的枝叶。

4. 但西藏是中国“发现史”上极为特殊的章节。对中国人来说，它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发现”，这两次“发现”的标志性人物是两位女士，一位是马丽华，另一位是刘曼卿。

一九三〇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书记官的刘曼卿女士受命只身赴藏，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虽“道路梗阻，积雪没胫，盗匪充斥，其间屡濒于危，而女士以不屈不挠之精神，排除万难，卒获达使命而返”，随后，著《康藏轺征》一书以志此行。

刘曼卿的父亲为世居拉萨的汉人，母亲为藏族，一九一一年举家迁往印度，一九一八年到北京，这年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刘曼卿十九岁。我们在《康藏轺征》中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五四青年”。她的眼光完全是现代的，着意之处在理性、教育、妇女解放、社会发展，她对西藏并无任何浪漫情怀，支持她“排除万难”的，是五四式的“救亡”激情和浮士德式的英雄气概。

鉴于刘氏本人有藏族血统，又在西藏度过童年，她的这种姿态尤其耐人寻味。它强烈地预示着中国巨大的现代化进程对西藏的

主流认识取向：西藏是前现代的，亟待唤醒和改造，就像整个中国亟待唤醒和改造一样。

这种取向一九四九年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论述中得到了确认和强化：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在历史进步的阶梯上远远落后……

——这是第一次“发现”，也是持续至今的“发现”。在《西行阿里》中，马丽华无意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同行的一位藏族人类学家，“自小便在母亲襟袍里远行数千里从康地前往拉萨朝过圣，幼年时便在寺庙里注过册，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成人”，如今“却以异乎寻常的冷静眼光和理性头脑接纳一切见闻”：

这位训练有素的学者，兀自走得太远：“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就时常认真地批评弟子们的不严谨，说我们神神道道，陷入传说不能自拔。他也进寺庙，也了解传说，但用的是知性的眼光和耳朵。每每看到汉人和洋人们拜神灵偶像，大大地不以为然：“雪山湖泊本无生命，人们赋予它们灵性罢了。”

——看到此，我不由得想起了斯文·赫定，想起了刘曼卿。
在同一段中，马丽华提到了那些“虔诚”的汉人和洋人：

年轻人们的车却久久不至。后来才知道是月光下的土林迷住了他们，不仅停车欣赏，且举行了虔诚而浪漫的拜祭仪式，此后每到一寺院一圣地（山，湖，神奇风光），皆如是。非西藏人虔诚起来比之佛教徒犹有过之。不久连南希教授也屡屡施行跪拜大礼。

——这些人的“虔诚”从何而来？很难想象回到自己的生活后他们会依然如此“虔诚”。

5. 第二次“发现”，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次的“发现者”主要不是科学家、理论家和政治家，而是文学家和艺术家。

一九八五年，扎西达娃发表短篇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第

一次,西藏以神奇的形象进入汉语文学。正是由这篇小说开始,中国人发现了感受西藏的另一种取向:西藏不再被置于进步一落后的客观历史判断之下,西藏与灵魂有关,它不再是等待改造的对象,而是昭示着在现代逻辑之外的神秘浩瀚的可能。

于是,一个新的西藏被“发现”。如果说,第一次“发现”将西藏纳入我们自身,通过科学的和社会历史的论述,它被合理化为普遍秩序的一部分,那么现在,西藏又被重新放回了“远方”——

在陈丹青的绘画中,注视着人物和景物的目光隐含着对差异的高度敏感,画家和对象之间有深远的空间,画家谨慎、恰当地保持距离,以便玩味这个空间的复杂含义。

这个空间在马原的小说里转化为无穷无尽的叙述圈套,在拉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你永远不会找到真凶、真相或决定性的线索,但是,你始终谛听着迷宫中心那头怪兽的喘息。

——西藏超出我们的经验,成为梦想与遥望与寻觅之地,寻觅不是为了印证我们的“有”,而是为了印证我们的“无”。在历史和时间之外、在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幸存的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精神的“异域”。

这种“异域”生成于八十年代生机勃勃的文化气氛中,它在根本上是对我们自身的开拓和探索: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我们看到一个马尔克斯化的西藏,从而“发现”了马尔克斯式的自我;同样,在马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博尔赫斯式的西藏,也“发现”了博尔赫斯式的自我。

博尔赫斯或者马原的小说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怖,叙述谋杀了事物之实在;八十年代,我们由此惊奇地发现了小说艺术的可能性,但我们同时可能摒弃了事物的温度、呼吸和生命,叙述成为华美的暴力,它的成功是事物的死亡。

所以,与其说我们通过小说“发现”了西藏,不如说我们发现一个被全面抽象化和异域化的西藏特别便于施用某种文学想象和修辞。马原至少还在西藏呆了几年,很快大家就意识到,几年或几天甚至一天也没有,对小说家们并无差别:有位朋友,从未去过西藏,也写了几篇西藏故事,据我所知,还真的没人看出破绽。

——而马丽华把西藏从宏大叙事和形而上学的玄想中释放出

来,她恢复了,准确地说是建立了一种对西藏的经验视野,她带领我们看西藏,看没有被各种叙述所伤害、所遮蔽的西藏。

6.《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马丽华在二十几年时间里行于西藏的东西南北,写下这四本书,一种体验西藏的新方式由此形成。

早期探险者的动机各有差异:为了传教、为了商业利益、为了帝国主义扩张,或者像斯文·赫定那样为了求知,像刘曼卿那样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事业;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他们真的都不太在意自己,他们将一切艰难险阻、一切成功和失败归附于某种宏大的意志或意义。

我曾读过《鞑靼西藏旅行记》,两位法国传教士一八四四年从赤峰出发,行经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于一八四六年抵达拉萨,他们盲目、孤独地穿越陌生的世界,每一步都吉凶莫测;然而,这部书居然写得如此质朴、超然,似乎他们从未意识到正在进行英雄壮举。

还有斯文·赫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有众多的中国仰慕者,他被想象成浪漫英雄。但是,读他的书,我所感到的是优雅的自制,他当然是高傲的,但那是被内心深处的尺度感精确平衡着的高傲,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有意义,但这意义绝非止于个人或归于个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次“发现”和第二次“发现”的重大差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已经不是为了补充、拓展某种外在于自我的宏大图景,“发现”的意义只能在“个人”层面上确证。

马丽华的四本书提供的就是一种“个人”叙事:

远行者,一个总是出远门的人,用了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奔波在高天阔地的山野间。是漂泊地,也是归宿地。五年前的藏东山地牧场,那个冬日的黎明,我们将要踏上归途。山野冥蒙中,牧民在冬窝里为我们烧茶送别。铁皮炉里的牛粪火闪亮,映照着一张

张如大地如岁月的脸庞。酥油茶的浓香溢满了小小的空间,这是前方漫漫长途的最后温热,如诗如画般铭刻在心底了。这诗画的最后一幕,是曙光微阑中,与那些一生可能仅谋一面的牧民男女们互致祝福挥手告别的情形。

那一刻,我觉得生命中有些什么正离我而去,永远地融入了那片冻土地。(《诗化西藏——〈走过西藏〉第四版后记》)

在这幅图景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我”,这个“远行者”,她在漂泊,她在漂泊中找到了“归宿”,而这“归宿”并非是某种历史、文化意义,而是“生命”,生命因漂泊而如诗。

很难想象斯文·赫定或刘曼卿会这样自我表述,马丽华由此确定了一种新的意义模式,至今盛行不衰。

7. “漂泊”,这是马丽华的写作中的关键因素,对于西藏的发现史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因素,第一次,人在这片大地上的行走仅仅是为了用身体去经历,为了身在现场,漂泊本身就是归宿、目的。

在这个时代,通过电视和网络,人间万象在我们的眼球上清晰映现,我们在千里之外观看任何一处现场。尽管如此,身在现场的意义还是非同寻常:我们本能地承认在场者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他们的身体,在一场电视转播的战争中,相对于演播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我们更相信战地记者,因为他们“在”那儿,我们相信身体胜过相信任何理念。

当然,我们常常忘了,在场者同样会一叶障目,会分拣和歪曲事实,他们很可能利用在场的权威行骗,他们会背弃自己的身体:关闭眼睛、皮肤和直觉,让成见滔滔不绝向外流泻。

而马丽华,用佛家语说,此人有天生的“澄明”,一种直接触及事实的能力。

很多作家都有这种能力,比如托尔斯泰,他烛照入微,一切浮辞伪饰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但托氏的能力可谓以天算胜人算,是绝伦大智,而马丽华的能力则来自罕见的热情和善良。

读这四本书，我认识了马丽华：她是如此热情，她在热情鼓荡下外向——她惊叹地接纳眼前的一切，她不是一个缜密、细致、冷靜的观察者，相反，她总是很匆忙，这种匆忙不是草率，而是遭到巨大的、缤纷灿烂的景象的轰击，她在快乐地招架。她的身上澎湃着放任的感性力量，她也思考，她也有观念和成见，但是，当身在现场，当事物从四面八方扑来，她常常忘了思考，她张开所有感官喜乐地体会；她是善良的，这不是说她的头脑里有铁一般的道德律条，而是她对人、对事物怀有一种小心翼翼的爱，她唯恐伤害一切，她不忍“批判”，甚至不忍“深思”，因为她本能地觉得任何归纳、演绎、追究和揭破都是对人、对事物极不厚道的侵犯……

人类学家格勒和周星都曾谈到马丽华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她的写作体现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这一根本立场，但我认为，马丽华是个天生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即使她没有受过有关的学术熏陶她也会是，我宁可把她看成她本来就是的那种人：她是诗人、是文学家，而诗与文学的根本要义就是尊重和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将世界从使它干涸的种种意识形态下解救出来，恢复它的丰满和复杂。

在这个意义上，马丽华的漂泊与行走与“生命”有确凿的关系：远行者虚怀若谷，她是“空”的，她用身体感受世界，她接纳生命的一切可能性，由此，她的生命壮观、充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丽华标志出对西藏的第二次发现：斯文·赫定或刘曼卿绝不会像她那样观看西藏，他们都是被强大的先在理念所支配的英雄，他们必定有力地筛选和编纂自己的所见；而马丽华通过她的执著行走，将扎西达娃等人开启的文学叙述扩张为经验的盛大狂欢。

于是，几乎是第一次，汉语世界的读者直接面对驳杂的、近于真实的西藏：它的神界和人界、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它的可理解和不可理解、它的亘古长存和流动不居……

8. 某日，我偶然行经北京的后海，这是一片相对完好地保存了北京旧时风貌的区域。在这个城市，“现在”正饕餮地吞噬“过

去”，后海如同孤岛，维系着我们与前人、与千百年民族生活的联系，让我们感到时间原是有来处、有纵深。

但后海已灯红酒绿，它变得妖冶、暧昧，都市新贵们以混乱、矫饰、自鸣得意的趣味改造着这一地区——经过一间又一间酒吧，我猜想一幢幢房子里可能多少年前居住着诗人、武士和朴素的百姓，我知道至少其中一间住过郁达夫，一个朋友在那酒吧的洗手间里告诉我：咱们正在郁达夫家里撒尿。

然后，我在银锭桥头看见了“西藏”：巨大的玻璃窗内，琳琅满目地堆积着西藏风格的家具、佛像、面具，木门半掩，门内，明亮的灯光炫耀着一地鹅卵石，它们会不会崴断了细长的鞋跟？

——来到这酒吧，就来到了西藏？

这时，我想起了马丽华。我知道，后海岸边的那间酒吧与马丽华有关——她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兴起的“西藏热”提供了重要动力。一九九四年，马丽华将《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合为《走过西藏》出版，她对这部书的市场效应本不敢心存奢望：“我何尝不知，这类题材的边远，文化情景的隔膜，按以往的经验它很难进入大众社会。”（《诗化西藏——〈走过西藏〉第四版后记》）

然而，“以往的经验”失效了，《走过西藏》竟成了畅销书，某种程度上因为这部书的刺激，“西藏”本身也迅速成为重要的时尚元素。到二〇〇六年，在中国的城市，“西藏”成了飘扬在成功、金钱、欲望和迷茫之上的华美旗幡：谁不曾神往地谈论西藏？谁不曾去过西藏或要去西藏？谁没泡过西藏风格的酒吧？谁没看过有关西藏的书或杂志或电视？谁不曾在某个瞬间为对西藏一无所知而自卑？

所有这一切，我无意在此申说，那将是复杂、庞大的论题；我有兴趣的是，马丽华对此作何感想？

是的，马丽华是善良的，她从来不忍伤害事物，我相信她会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再说一遍：“国人渴望认识我们的西藏，并由此推进了民族间文化间的了解和交流总是好的；我心目中的西藏由此广为人知并引起普遍的神往总是好的。”（《诗化西藏——〈走过西藏〉第四版后记》）

但是,当西藏被论述和界定出某种化石般的文化本质,并因此成为一种消费品时,马丽华在想什么?

9. 在第一次“发现”中,西藏被指认为“落后”,它在第二次“发现”中却获得了辉煌的精神光环——马丽华在《西行阿里》中对那群虔诚者的描述在我看来意味深长:我们来自充分现代化的世界,西藏是我们“发现”和保留的跪拜之地,是我们精神上的公园或后院,我们热爱西藏,我们热爱它的方式是希望它永恒不变……

但这是道德的吗?我们的根本动机不是自私和蛮横的吗?在马丽华的书中,一位美国女士在西藏“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这当然是她的自由,但西藏有义务永远、彻底地向外人、向游客表现它的“美丽”吗?该女士还说,“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寻求”,话是不错,但如果你看到的只有“美丽”,你又怎么能听到对方是否寻求?当我们企图把一种文化、一种活生生的民族生活从现代化进程中“保护”起来时,我们是否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的“美感”?我们难道要通过这种方式将西藏在巨大的全球化体系中隔离在被观赏的地位?

——这些问题很难有清晰的解答,但是,它们肯定暗自困扰着马丽华。在《灵魂像风》中,马丽华写道:

在我回顾描述了仍在延续的传统人生,记挂着那些悠久岁月中的村庄和寺院,那些人影和音容时,一种忧郁的心绪漫漫开来。我觉得心疼。觉得不忍和不堪。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不自觉的意念从脑海深处渐渐上升,渐渐明晰。浮现于海面,并渐渐强化起来。我凝视着它——这是对什么的不以为然。

不是对于生活本身,人群本身,不是对于劳动者和歌舞者,甚至也不是对于宗教。

是对于灵魂和来世的质疑吧——是,或者也不尽然。

灵魂和来世的观念尽可以存在,与基督和伊斯兰的天堂地狱并存于观念世界。

只是,灵魂和来世观念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

如此左右着一个社会和世代人生，则令人辗转反侧地忧虑不安。

——谁从中获益？

——老百姓本来可以过得更好一些。

——人生，造物主恩赐于人的多么伟大、丰盛的贵重礼品，你其实只有一次生命。纵然果真有来世，也应该把今生看作是仅有的一次。

——缺乏的是一次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

在理论上提出和展开问题并非马丽华所长，我完全可以逐条反驳她的疑问，而且我自信可以巧舌如簧；但她的犹豫和诚恳使我感到虚弱：我知道我的巧辩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但马丽华却必须负责任，当她提出疑问时，她是“西藏的马丽华”，她已经把青春、把大部分生命交给了那片土地和人民，她的疑问也是针对自身的反诘。

《灵魂像风》因此成为这四部书中最具深度的一部，马丽华揭开了西藏的光环之下真实的躁动和困境，在这部书中，她无意中呼应了先行者刘曼卿的声音。

是的，老问题至今仍在，它被马丽华、被那位“不语怪力乱神”的藏族学者从西藏的内部深切地体会着。

尽管取向不同，但第一次“发现”和第二次“发现”同样源于我们的现代性焦虑，正是第一次引发了第二次，“西藏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兴起，只有在中国巨大的市场化浪潮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这是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对自己做出的文化补偿，这种补偿本就预设在现代精神之中。

那么，西藏呢？难道西藏应该成为这种补偿品？

西藏一直是孤独的，马丽华也是孤独的。这个以漂泊为归宿的人最终发现，即使在西藏，人也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

深夜拥被独坐。脑海和心怀一派空虚。突然间，一个念头不期而至——

你何时才能结束心灵的流浪？（《灵魂像风》）

——这时，她是否看出了我们所有的人：向往西藏的人、前往西藏的旅游者和跪拜者，我们心中深藏的不可救药的空虚和自欺？

10. 于是——

西藏的高山和山谷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决定不久就去游览。我定过许多计划，打算过许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来就使我高兴的就是准备去游历西藏的名湖玛旁雍错和附近积雪的冈仁波齐山。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甚至西藏我尽管向往也一直没有去成。我忙于工作、赚钱、看电视以及生儿育女，走不开。我用日复一日的生活代替爬山渡海以满足我的游历热。可是我仍然定计划，这是一种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人能禁止的快乐。我常常梦想有那么一天，我漫游喜马拉雅山，越过这大山去看望我所向往的山和湖，然而年龄不断增加，青年变成中年，中年以后的时代更坏。有时我想到也许我将要衰老得不能去看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了。这种旅行即使走不到目的地也是值得一试的。

这些高山出现在我的心头，

山虽然危险，染上了玫瑰色的晚霞，多么美丽。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

二〇〇三年春为本书台湾版所作序言

二〇〇六年修订

一九九四年作家版序言

周 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我因应邀出席中国西藏雅砻文化节，归途中在拉萨有幸再次见到了才华横溢的作家马丽华女士。大概是由于我们在长谈中，有了许多共同感受，作家拿出她的新作，就是读者眼前的这本《灵魂像风》，嘱我为它写篇序文。我一时踌躇，不知身为学者，如何才有资格去评判一部文学作品。好在作家颇为看重来自学者的观点，就像我们很高兴有作家关注学术领域一样。

其实，藏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格勒博士在为马丽华女士的另一部作品《西行阿里》所写序言中，对作家其人、其文、其学，已有了热情中肯的介绍。我很同意格勒博士的基本看法：马丽华女士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它确实已经延伸到我们所从事的人类学领域里来了。

我想马丽华女士在这方面的成功，大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这位女作家始终是一位不知疲倦、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的观察者、寻觅者和体验者，同时，她还是一位孜孜以求的思考者。